第十三章　并不如意的自主婚姻

告别岫岩来到海城等了一两天的火车，然后一车就直达长春。在东北大城市中，长春久已闻名，但这还是头一次去。首先给人的感觉，便是在东北各主要城市中，论规模虽次于沈阳、大连、哈尔滨，但既然曾被日本人规划为伪满傀儡政府的“国都”，还是颇有特色的。首先是大型建筑物多，马路宽而且直，绿化好，公共设施整齐。那儿又有前不久因整编而转业和即将转业地方的原籍在那儿的战友简福春和牛长绪等同志。可谓天时、地利、人和齐备。只是地势偏北，冬季要比南满严峻。好在到那儿时已临近“五·一”，除偶尔有风沙之外，一时尚无日子难熬的感觉。后来进入严冬，虽然寒冷，但驻扎处原是日本人居住区，暖气设备齐全，只要不外出，在室内还是很好过的。



与长春就地转业的老友合影（后排左起：简福春、费文成。前排左起：林怀秋、牛长绪。）

那儿是东北军区政治文化干部学校，即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政治干部学校。原有不少政治、文化教员，又加上我们这些适合于做军校工作的较有文化的人员。军校虽然也是军事系统，但比起野战部队来，要安定多了。所在地段又是长春的较为安静的原日本人居住区，中国名为“西大营”，在西安大路与白菊路之间，紧靠原关东军司令部及司令官邸后身，一侧离胜利公园不远。住房全是二层楼，管道煤气、暖气、自来水、水洗厕所一应俱全。而且周围清洁整齐，绿化程度很高。到达时正是丁香花盛开的季节，院内香气扑鼻。当时社会风气良好，每栋房子虽然只有一道矮矮的围墙，但洗濯的衣物只要是晒在院内，一整天不收都不会遗失。当时的长春人口稀少，一到夜晚清静异常。以白菊路的电车为例，常常是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到三五位乘客便开车，很少见到满员的时候。

刚到长春时，揽胜好奇，几乎走遍了全市的各个角落。现在是一大名胜的南湖，当时还是城郊荒野上的“水泡子”，很少人迹，当地人谁也不去。然而我们这些外来的当兵青年，一到假日便前去游玩。因为一不用花钱，二又可以下湖洗澡摸河蚌为乐。河蚌尽管不能食用，但也怪喜人的，有一天几个人用自行车竟驮回来好几大麻袋，拿回来交给大食堂，使厨师也无可奈何。



与老战友简福春、老同学张维训合影于长春南湖

为了排遣与小稣被拆散的痛苦，一到星期天我便到大街小巷去串，一早天不亮洗完衣服晾起来就出动，不到天黑不回营。当地的“二人转”决不亚于辽宁，后来发展成为“吉剧”。我特别喜欢当时还没有女角而由男角“包头”演唱的那荡气回肠的《王二姐思夫》唱段。

逛街还是有了收获。我利用宣传部门处理旧报纸之资，为公家在旧书摊儿上，购买了大量的古典文学善本，从而近水楼台大饱眼福。什么《燕山外史》、《老残游记》、《杜诗镜诠》、《儒林外史》、《镜花缘》、《石头记》、《西厢记》、《水浒全传》……有的是过去从未接触过的。更为重要的，是购到了皇宫秘本中日文对照版本精良的《战国策》、《韩非子》和《春秋左氏传》。这几本书经领导同意，给了我个人。后来尽管受命运捉弄，我由北而南，从军队到地方，颠簸了半个多世纪，这三部书却始终没有离开过我。



解放军长春政文干校教务室人员合影

此时原科内大部分女同志或转业地方，或送大学深造，或已结婚嫁给老一点儿的丈夫自找归宿。只有年纪较小、文化较低的Z，被分配到军校电话总机当了电话员。宣传科内有几名女同志，后来她们被分配到新成立的俱乐部。当时部队仍在向文化进军之中，由于工作性质的接

近，和后来让我兼管在职官兵的文化学习，大力推行“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我的头衔是除了宣传干事之外，还兼任着在职官兵的文化夜校的教务主任。从年纪来讲，我已经 25 岁，也到了应该恋爱、结婚的年龄。多少年来心中从未忘记过小稣，但毕竟是已经被判处了“死刑”，且已失去了联系，对她的去向、命运一无所知。也许是出于一种对被扼杀的爱情的报复的畸形变态心理吧。在同时代人中，由于我的军龄、干龄长，已经具备了恋爱、结婚的条件。而不够条件者还大有人在。我也正是利用了这一“得天独厚”的“特权”，来发泄自己的一腔不满的。

由于工作上的接近，我“就地取材”看中了一个人，她就是湖南津市人 C。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速战速决”与她结了婚，生了子女，从 1953 年春节起到 1985 年 5 月 25 日止，共同生活了 33 个年头儿。说实在的，这位学生出身、早年丧父，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中并不得势，由寡母 N 一手拉扯大的大女儿 (她还有一个妹妹叫 S)，还是个较为纯朴的人。出身于旧社会，在家庭中又是处于无权的地位，使她产生了只要是能挣钱养活老母，找一份工作，可以自立就行的思想。由于天资平平，学习又不刻苦，为追求出路而到处乱跑，解放前夕虽由洞庭湖滨、澧水河畔跑到省城长沙的一所高中就读，其实也没学出什么名堂。正好赶上解放，不久又开始了“抗美援朝”，在部队招收文化教员、文工团员的浪潮之下，于 1950 年冬，她也就报名参军，被分配到了东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论个头儿不高，最多 1.55 米；论形象，也是平平，最多算个中等，好在矮而不粗，也还苗条；论讲普通话，倒还有点儿悟性，也许是由于湘西北地域的关系吧，在湖南人中要算是讲得好的；演戏不善表演，唱歌不仅嗓子条件欠佳，还有轻微的跑调；舞蹈倒还步履轻盈，也只限于当时的交谊舞。所以到了文工团之后，分配给她的，只能是做些打杂、后勤方面的事。后来终于在精简机构中，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在“优化组合”中被“组合”出来了。当然同时离开东政文工团的不止她一个人，同时一道参军的一男三女，100%地离开了文工团。虽说进过高中门槛儿，到底也难以胜任文化教员工作，因此她被分配到了军

校的先是宣传科,尔后到了俱乐部当电影放映员。

当时的军队,是一种封闭的社会,很少与外界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就地取材",在狭小的范围内比较之下,我选择了她。回过头来看人生,她作为我的战友、同志和妻子,与我共同度过了多灾多难的大半生。她的为人真诚,工作认真负责,作风正派,团结人。对子女,尤其是对儿子关心备至(由于出身寡妇家庭,中毒而不自觉,自己深受重男轻女之害)。她虽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但由于在家庭中所处地位低下,处处仰人鼻息无权支配财产而非常知道节俭。可以说由于我挨整受罚而跟着我吃了一辈子苦,倒了一辈子霉,甚至可以说在升迁、提资方面,都受了我的牵连。此点我愿向她九泉之下的亡灵,表示极大的歉意。

虽然我们共同度过了由军队到地方,由北方到南方的 33 年人生,但只能说这是一次并不十分幸福、质量欠佳的自主婚姻。一开始虽然她并不讨厌我,但也不是真正爱我。因为她已经有所爱,只是由于那个人与她的军龄相似,年纪比她还小,官职比我还小,而不允许她们相爱、结婚。我只是凭借着"特权",经过短短的突击性的恋爱,才与她成就了"合法"的婚事。从某种意义上讲,叫作利用优势进行了"不平等的竞争"。说心里话,我也并不是对她真心相爱,也许是出于发泄对我与小稣爱情的被扼杀吧。

在我 1953 年春节同 C 结婚前后,小稣也有着与我相似的经历。后来她告诉我,她与许多日籍解放军中的遣返前的女同志一样,在突击性的结婚风潮中,也与一个本不相爱的日本人结了婚。所不同的只是,她并没有像我一样过了 30 余年的并不理想的"马拉松"式的婚姻生活,而是于 1954 年春归国前夕在天津给她留下一条"孽根"之后,在前途茫茫的熟悉而又陌生的母国,还没生活上多久,或许连一年都不到,那人就把她和孩子甩掉而另寻新欢了。从此她一个人带着一个男孩 G,与孩子相依为命,凭着身在讲究学历的资本主义社会,因学历不足而并不丰厚的工资,苦苦挣扎了 30 余年(当然后来儿子成人,她自己发奋通过自学取得了较高的专业学历,生活才有了好转)。对她这爱情生活的遭遇,我非常理解,正如

她完全理解我一样。

在长春的第一个春节我与C草草结婚，我时年26岁，C24岁。当时我们俩除了身上的军装以及很少的换洗内衣，各自的一床棉被之外，几乎一无所有。全部家当用一根扁担就可以挑走。全靠同样过着供给制的穷哥儿们给凑钱，为我这冲破禁条第一个结婚的连级干部，买了只热水瓶与一铺新床单，才算有了点儿喜庆气氛。婚宴是我借了点儿钱买了箱啤酒，食堂给拌了一大脸盆免费凉菜，大家总算为我这第一个同时代人的成家，热闹了一番。

然而新婚之夜就弄了个不愉快，它就像预示着这桩不幸婚姻的悲惨结局。农历除夕夜，正碰上校部举办舞会。说老实话，我的舞跳得不行，只能说是为了跟上未来妻子的舞步而仓促地学了几着入门动作。而C则是在文工团时代，就常常奉命为军区首长伴舞，自然乐声一起就满场飘飞舞技不凡。但作为新婚之夜，无论如何也得将就着我这“新郎”好歹跳第一场吧。然而大出我的意外的是，刚一开场，她便第一个起身找别人跳了起来。这使我感到由衷的不快。第二场仍没来请我，把我凉在大庭广众之下，又和平时的老舞伴跳起来。这时我已经感到被冷落得十分难堪，不由得火冒三丈了。也许在第二场下来休息时，有的女友批评了她吧，在第三场开始时，她便从很远处朝我奔来。我那时也许是因为受到刺激而有意报复她，故意置她于不顾，嗖地一下站起来，朝着坐在完全相反的方向的小个子女教员小D快步走去。小D也是湖南人，是个正经八百的大学生，文化知识挺丰富的，平时就与我很谈得来，年龄也与我相仿。我和小D跳起来，在众目睽睽之下让C扑空，这无异于让C当众出丑。这三场舞，小D都看在眼里。跳完这一场之后，我就一个人离开舞场去了二楼的办公室，在那里一个人弹起了曼德林。后来舞场上是什么样子，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大约过了将近半个小时，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响。原来是小D来了，她敲门进来。一是她平时对我不错，自然对我多了一份关心，二是出于女人的细心，整个过程她全都看在了眼里。她是怀着好意特地来劝我的。劝了我好一阵子，然后她又回到了舞场。我一个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在办公室直弹到将近半夜舞会散后，才回到新房。这时C已经睡下，我也胡乱上床，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谁也没有理谁。两个人首先想到的，无非是这样的情景：假如我的婚姻对手是小稣，她的新郎是小B，决不会出现这场舞场风波的吧！

跳舞虽然是小事一桩，但它反映着这对夫妇的感情。这反常的新婚之夜，已经预示了这对夫妇的前景。要么很快就会散伙，要么勉强维持一段时间，最终也得分道扬镳。万万没料到我们的婚事竟有33年的寿命，直到1985年5月25日C在长沙病逝。我们所想的心事，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强扭的瓜不甜！"诸如此类的事，在新婚阶段时而有之。新婚后不久，各自又不得不卷起铺盖卷儿回到各自的集体宿舍。这是因为虽然批准了你们的婚姻，但因官职太小，组织上并没有给你们提供住房的义务。这明显是不合情理，但在当时也无可奈何，这也助长了夫妻之间感情的隔阂。以致C说出了"若不是因为怀了孕，还不如趁早离婚"的话。

婚后被迫分居了不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军队为了实行军衔制，决定女同志除特殊需要者外，一律转业地方。C被列为第一批转业对象。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在筹建，她被分配到当时称为"六五二厂"的人事处，成为建厂元老之一。如果我们就此分手，她在那儿扎下根儿，也未尝不是好事。摆脱这并不理想的婚姻，她或许免受大半生的牵连与颠簸，说不定有个更好的未来。她之所以丢下将来的这份"美差"，一则也许建厂之初是基建中的一片荒原，还一时看不出光明的前途，而且在建成工厂之前先要吃上几年的苦。二则也许是她腹内已有一个胎儿(就是我们的女儿S)，而我又是个四海漂流的军人，万一我远走他乡，她将孤苦无依。尽管我并不是她真正的意中人，但既然结合在一起了，也只能"风雨同舟"。第三，她受旧思想影响较深，不愿轻言离婚，也只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吧。

果然在她转业不久，我就奉命被指名调往南京某军校。我这个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只好到尚是荒郊野外的工厂建筑工地与肚子日渐膨胀的她匆匆告别，只身南下先到东北军区报到转办手续。谁想出乎意料的是，被军区报社将我截留。尽管我一心想到

向往已久的江南看看，也只得服从组织。正因为有此思想基础，所以工作表现也就比较随便，后来竟发展到故意留下不良印象而达到离开大机关，宁愿到下面去的目的。比如，不久便发生了为妹妹的助学金问题，而与S镇中学发生口角的事件。后来果然在机关干部会上挨了批评，而终于达到了离开高级机关的目的，但也为此而付出了代价，在档案中又增加了一条“劣迹”。

但在东北军区政治部工作的一年时间里，有两件事使我得到了最大的满足。这若不是来到大机关，是经历不到的。

第一件事，就是参与1954年春开展的全国性的全国人民第一次慰问“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活动。作为一名军方工作人员，我被临时抽调，参加了慰问团办公室的工作，至今一枚白地红字长方形横写的工作人员佩带的铜质证章仍然珍藏。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已接近尾声，大部分志愿军已撤回东北地区驻扎，虽然还没有实现全部从朝鲜撤军。当时的东北，集中了原四个野战军及总部两个中央直属兵团的精锐不下百万，也是往返中朝的陆上通道，因此，东北成为此次慰问活动的重中之重。我借办公室工作人员之便，得天独厚地多次饱览全国各剧种中的最优秀演员的多次精彩演出。以京剧来说，遍看了“四大名旦”(梅兰芳、程艳秋、荀慧生、尚小云)、“四大名生”(马连良、谭富英、周信芳、奚啸伯)的《宇宙锋》、《贵妃醉酒》、《锁麟囊》、《荒山泪》、《红娘》、《尤三姐》、《昭君出塞》、《一捧雪》、《打渔杀家》、《四进士》、《徐策跑城》、《白帝城》等名剧。还观看了在国内和平环境下都看不到的名家联袂演出的全本《群英会》。其中有：《舌战群儒》、《草船借箭》、《蒋干盗书》、《计打黄盖》、《借东风》等名折。阵容之齐，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马连良、谭富英、周信芳分别饰演前后孔明、鲁肃，叶盛兰饰演周瑜，裘盛戎饰演黄盖，袁世海饰演曹操，肖长华饰演蒋干。全是超一流的演员。而且这千古绝唱一连看了好几场。就名



1953年，作者参加“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办公室时的一枚铜质证章。

家个人专场来说,以程艳秋的《锁麟囊》为例,我一连看了三场!

第二件事,就是在四野南下时,留守东北未能领略南方风光,好容易年前奉命南调,又被截留东北,对此总感到十分遗憾。说来也巧,慰问团的工作一结束,立即组织东北军区所属的军事院校领导及有关人员,在全国进行交流。当时我已调到东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军校科,抽调我参加组团工作,并被任命为参观团的秘书。行动路线是先在东北进行参观、学习、交流,到了东北的所有军校,如:沈阳的高级炮校、高射炮校,哈尔滨的航空学校,牡丹江的航空学校,齐齐哈尔的步兵学校,大连的海军学校,旅顺军港,大连军队外语专科学校等。然后进关直奔南京,到了南京军事学院、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南京军事师范学校。接着生平第一次乘江轮溯长江而上去武汉高级步校。当时武汉长江大桥尚在筹建之中,是长江上的中国第一桥。在南京,津浦线至南京的火车还靠轮渡,而京广线则被分为两截,江北从汉口到北京,江南则从武昌到广州,过江只能靠江轮,火车尚无轮渡。武汉高级步校我本来有两位熟人,一位是中学同学李占东,可惜当时还没联系上。另一名是同乡S镇人Z。Z作为随军南下的知识青年,参军后直抵广东番禺在四野军政大学文工团当舞蹈演员。抗美援朝高潮我在安东四道沟时,曾与她通过一段时间的信。她曾在给我的信中,对我在炮火硝烟的抗美援朝战争前线而表示过羡慕。我给她曾寄过几次战地小诗,她也回寄过一本外国小说,叫作《哈吉·慕拉》,一本外国歌曲集。她还寄来过一幅根据想像创作的朝鲜舞的剧照。我当即请科内画家简福春画了下来。后来她来信说,那是文工团的资料,又将照片索回。通过她得知中学同班同学抚顺人田而宜也在该文工团内,正在乐队吹小号。田和我通过两次信。Z当时在高级步校俱乐部当小鼓手,我到该校时正逢她参加早晨的升国旗仪式。休息时我请了一会儿假去看她。她热情地为我冲了一碗加白糖的鸡蛋。这在当时也算是最高礼遇了。没想到1954年春在武汉与她“他乡遇故知”之后,又因老同学、老战友李占东的关系,在30年后,又在武汉与她见了几次面。

下一站是长沙。长沙久闻是历史、文化名城。我们军校参观团

的主要目的地，当然是解放军第一政治干部学校。当时的长沙还不成格局，位于郊区黄土岭的这所学校，周围果然是黄土一片，车过处尘埃飞扬久久不落。恐怕通自来水的地方都不多，满街都是卖湘江水的。大街小巷全是石板路，路人木屐声声，构成一道南国古城特有的景观。在第一政干校，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欣赏到湘剧高腔。那高亢的帮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0年后仍记得剧目是《打猎回书》、《扫松》和《尼姑思凡》。来到长沙，自然要参观革命纪念地清水塘、自修大学、桔子洲头、爱晚亭和天心阁。自然要去韶山瞻仰毛泽东的旧居。在整个参观过程中，最忙的当然是我这个秘书了。既要沿途一路与各有关单位联系日程安排，又要负责数十号人的食宿和交通、结账等琐碎事务。好在正当年富力强，也不感到太累。一路上我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手续弄得一清二楚，以致博得了科长P和全体团员的称赞。长沙的日程一结束，便要踏上归途了。当时尚无贯通南北的京广铁路。为了使工作尽善尽美，对一行人负责到底，我必须把这支队伍送到京汉线的起点站汉口，把他们的归程车票买好，安顿他们上了车，把一路上的各种票据分人头儿装入信封内交给本人，结好账，才算是彻底完成任务。送走他们，公事才告一段落。接着我还要办一件私事，那就是返回长沙，去看望我没见过面的，出生之后半岁不到，寄养在岳母家的女儿。人员上了北归列车之后，P科长给了我半个月的探亲假，再次只身南下、西行去湖南津市。



1954年春东北军区军事院校参观团留影（前排右二林怀秋）

写到这儿，作点儿补叙。我于1953年初夏南调被截留沈阳后，几经努力，于同年秋，终于又把C也作为随军家属，从长春的荒野一汽基建工地上调来沈阳。她作为被照顾对象，挺着个大肚子，被分配到离东北军区政治部所在地三经路不远的中共北市区委做宣传工作。虽然是部队批准的合法婚姻，也算是为了照顾夫妻关系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来沈阳的。由于官微职小,并没人考虑分给你住房。看看就要分娩,仍然连个住房也没有,我仍然住着集体宿舍,而她也只能暂时在北市区委的机关办公室里安身。在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商定她只身回数千里之外的湖南津市的娘家去分娩。至于往后如何生活,到时候再说,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听由命运的摆布。当时我一无路费,二又请不下假来,只能让她一个人去冒险。在离沈阳市南边 30 华里的 S 镇有我的老母亲,照说本来也可以在那儿把孩子生下。但由于我家的条件不好,南北方人的生活习惯差异太大,她决不愿意在婆家生孩子。更大的问题,是生下孩子如何安排的问题。她之所以决意去南方分娩,还因为她娘家的家境要好得多。尽管她寡母寄人篱下,并无权力,但在大面儿上,也不会受到亏待。何况我这合法的婚姻虽然没有给我住房,但是一旦生下孩子之后,孩子还是有保育费发下来的。因而不必让岳母家在经济上为难。津市是个鱼米之乡,听说很富裕。所以尽管我对她临产在即只身远游放心不下,也只能依她的主意办事。谁教我无能呢。说句宽慰自己的话,C 已离开故乡 3 年,这也是一次探亲的好机会。

事不宜迟,我急忙到沈阳北站为她送行。这样大着肚子只身作长途旅行的人,也确实少见。她后来告诉我,人们见她一身旧军装,又是现役军人的家属,一路上受到不少的关照。幸亏当时的社会治安情况良好,才没有出事。她平安地回到娘家津市不久便生下一名女婴,就是后来的长女也是惟一的女儿 S。对此,我还是很高兴的。但从孩子呱呱落地之时起,不知是何原因,也许是孩子出生时给其母 C 带来过较大的痛苦,也许是 C 出身于那样独特的家庭,有着超乎常人的重男轻女思想,也许是她对我们的婚姻不满,自从生下这个女孩儿,她就不太喜欢,总是看不惯。而对后来生下的两个男孩儿,则格外偏爱。直到 32 年后,她病入膏肓时,与两个儿子的言行一对比,才悟出女儿的好处,但为时已晚。

由于产假已满, 她只得把初生婴儿抛在远隔千山万水的湖南津市,又只身返回沈阳。她娘家由她二叔 P 当家,开着一家中药店,店名“谦和”,系从江西药都樟树来湘的经商者,已有数十年的历

史。解放初期由于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她的家庭虽然人口众多，但生活水平仍在普通城镇居民之上。加之地处洞庭湖滨、澧水之畔，物资十分丰富，远远胜于北方。以后来的“大跃进”引起的饥荒为例，当我在北方以柞树叶饼子为食时，这儿还以莲子和“灰萝卜”度荒哪。孩子是 1953 年 11 月 14 日出生的，1954 年 1 月中旬，C 抛下了刚刚两个月的婴儿，又独自回到了东北。在费尽周折之下，我才在副部长 G 某楼下，借到了一个楼梯间。在这旧社会原来是“门房”或“下人”的住处。而对我来说，已经是“天堂”了。

话说回来，我折回到长沙。手头儿虽然没有多少钱，但摆脱了重担，到了我单独活动的时候，一种无拘无束的天性又充分表露出来，想放松放松，潇洒一回。心想反正有出差补助为靠山，也不至于出纰漏，于是在登上去常德的小船之前，先踱入现在的大约南阳街一带的一家小酒馆。当时南方的物价极其便宜，要上几盘富于南方特色的菜，结账时也只花了几块钱。菜是故意点的在北方所见不到的“腊八豆炒腊肉”、“炒香干”、“炒红菜苔”和“春笋炒腊肉”。要了三两白酒。上菜时由于不了解湖南的习俗而破费了本来就不多的钱财，还闹了笑话。正如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所写的那样，筷子特长，菜量特大，而且又咸又辣，油又极厚。而酒却淡而无味，不似北方的白干儿那么强烈。所以菜剩下了一大半。真后悔不该点那么多样儿。当时的水路交通尚无从长沙直达津市的客班，需在常德中转。从小西门码头上了小船。船上全是长条窄凳，得挺直腰板儿坐着，连一点儿靠头儿都没有。船上的旅客也不太多。舒服与否对我来说不在话下，只要能充分领略江南的水乡泽国风光，就满足了愿望。船行得很慢，还不时停靠，全程需要 20 多个小时，还得在船上过夜。江风、湖风有点儿凉，多亏我披了一件旧皮大衣。船上的饮食也别具风味。那时吃的全是籼稻的糙米，大甑蒸气饭虽然有些硬，但咀嚼起来却很好吃。到达沅水之畔的湘北重镇常德时，已是天近黄昏。需在这儿过夜，次日一早才有去津市的长途班车。

下船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找长途汽车站，在站旁找家小店住下。然后打听好开车的时间，购好车票。幸好常德地区的口音很平，

接近普通话又很好懂。就是妻子C偶尔说上两句的那种语言,所以听起来感到很亲切。办完这一切时,已是饥肠辘辘,夜幕降临。于是就近找了家清洁雅致的临江小饭店。接受了长沙的教训,这次只要了两菜一汤,菜是江里所产的清蒸鳜鱼,炒青菜,汤是南方的酸辣汤。因见我是外地来的军人,老板还送给我一小碟当地名产"榨辣椒"。除了半斤米饭之外,我还要了一壶当地产的土酒,一面观看窗外暮色苍茫的景色,一面自斟自饮。觉得酒味甚薄,于是叫酒保又加了一壶。待到天完全黑下来,江上渔火闪烁时,才吃完这顿饭。人虽旅途疲乏,却被江景所吸引,来了游兴。沅江很宽,在夜色中,我来来回回渡了好几次,彻底过了一次江南月夜泛舟之瘾,以致使艄公可能感到这个当兵的是不是发了疯。

次晨经几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女儿的出生之地既是洞庭湖之滨,又是澧水之畔的小城津市。这儿不愧是江南鱼米之乡,不仅民风朴实,而且物资极大地丰富,景色也十分美丽。由于交通不太发达,有许多特产运不出去。当地的物价出乎意外地便宜,最好的活鱼也不过两三角钱一斤,腊肉、皮蛋更是贱得惊人,三四分钱即可买一个鸡蛋。岳母娘家人聂经理是当地工商会的头面人物,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在逗留津市的一个多星期里,作为"娇客",享尽了我这过着"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的军旅之人所从未经历的生活,天天宴会,早晚笙歌,真的让我"乐不思蜀"了。没想到在那样闭塞的边远小城,北方大戏的京剧却颇为流行,商会甚至雇请专门的教师,为各商家排练京剧平时娱乐,节假日粉墨登场演出。因此我这个能拉会唱的老京剧迷,虽然一身粗布戎装,也算得倜傥潇洒的人物。多年孀居膝下无儿的岳母N对我很好,这也许为尔后在患难中两次一道生活了数载,打下了感情的基础。其小婶(妯娌)也就是我三岳丈之妻,出身青楼,我称为三婶。由于我的莅临,她虽已偃旗息鼓多年,还破例在我的操琴之下,清唱了一段老生戏《捉放曹》,博得了满堂彩。

女儿S,在奶妈的怀抱之下,来见我这身在数千里之外的从未见过的生身之父。她们给取了个乳名叫"小秋",时虽刚刚四个多

月，但个子在南方来说算得上很高。岳母声称她十分“武烈”“好长”。由于生平第一次抱孩子，不知手往哪儿搁，差一点儿闪了孩子那稚嫩的腰。十来天的假期转眼即到，我只得依依惜别一生下来就远别父母的可怜的女儿和众多的亲戚返回北方。

回程在长沙等火车，有半天空余时间，我便轮渡过湘江，背上一根甘蔗当作解渴之物，独自沿着山梁由北而南地爬了几个钟头的岳麓山。当时的岳麓山还算不上是一座公园，只是荒山野岭，在崎岖的小路上只有些墓庐断碑。路过常德时买了一只小皮箱，它后来伴随了我 40 余年，直到 1999 年初夏最后一次搬家，更新家具时才甩掉。临上火车时，在长沙南阳街，又购得竹箱两个，春笋四只。这几大件不下数十斤，途中转车、乘船多次，由南而北数千公里，不知是怎样折腾回去的。也许靠的是年轻力壮吧，还不足 27 岁，所以并不觉得特别累。历时一月，回到沈阳的楼梯间时，见到我带回的家乡土产，着实也使 C 欢乐了几天。

在南方逗留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已经迎来了梅花、桃花盛开的季节，回到北方之后仍然春寒料峭，柳梢未青，风沙阵阵。这一年由南到北，我过了两次春天，可见祖国的幅员多么辽阔。

好景不长。有两件事，给我这个刚刚安顿在楼梯间的一家，又带来了新的忧愁。第一件事是又要添人进口。当时上面的指导思想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多力量大”，并没有“计划生育”一说。那时虽然不限制生育，但通过生活实践，我已经吃到了苦头。一个孩子尚且因无法安排而寄在数千里之外，如果再生一个，我这个不安定的小家，和我们的经济能力、精力又如何承受得起！为避免生第二胎，我曾在 C 从南方生下孩子回来之前，就想办法利用出差之便，从大连的“秋林公司”托人购到避孕工具(当时国内尚无此类用品)。从这一点来看，我可以算是计划生育的先行者。但由于命运的捉弄，未能如愿，仍然很快就怀上了第二胎。

第二件事，是恰在此时，我又奉命调到东北军区(后改为沈阳军区)所属兵种的工程兵部政治部。那就是后来出了赫赫有名的雷锋所在部队的领导机关。雷锋生前的许多珍贵照片，是后来我的同科

战友张峻所摄。雷锋的故事，是兵部文工队创作员陈广生所执笔。



原安东省公安厅址（东北工程兵部，与陈继武合影）

当时的东北工程兵，管辖数个工程兵团，正在辽南沿海一带数百公里的海岸线上，修筑防原子的国防工程。机关暂设在新金县城皮口，后来才转移到了与我渊源很深的安东市镇江山下原安东省公安厅址。我到皮口报到之后，按我的情况，自然又留到了机关。单身赴任流浪漂泊了几个月之后，随机关到了安东。时近深秋，妻子C已快临产。情况紧迫，经过努力，把她作为随军家属随我调来安东，在尚未分配工作之前即已临产。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从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娘家搬来“救兵”。那就是把她的胞妹S接来照顾她的月子。当时尚无住房，借住在后来确定为沈阳军区



工程兵部文工队（作者当时在外主办手风琴训练班，而未参加合影）

工程兵部机关的镇江山下的一所办公室暂居。这位姨妹相貌平常，为人倒也善良能干，后来相处30余年，时有来往。她到安东时，恰逢C阵痛。我赶紧请假，把C送往百里之外的军医院所在地鸡冠山。非但不能尽为人丈夫、父亲的职责，紧接着我就奉命即刻登程，去朝鲜的清津、端川、茂山和中朝边境的长白、靖宇、临江、抚松、集安、桓仁、通化、图们、佳木斯、吉林等地，作为中国人民第二次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个分团的团长，率所部沈阳军区工程兵部文工队数十人，去作为期一两个月的慰问演出。官不

大兵也不多，但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意义深远。身为军人，只能置家事于不顾。出发之前，还需要作两三天的各项准备。C 去医院后，只剩下了我与姨妹二人。同在一间大办公室的几张桌子上拉开距离开了两个临时铺，我举止十分谨慎。这也是姨妹后来特别敬重我的原因。





1955年春，于安东五道沟主办的工程兵部连队文娱骨干手风琴训练班（下图右三为作者）

对于住进产院的 C，在这儿得补几笔。中国有句老话，把“破屋、漏锅、病老婆”称为人生的三大不幸。我之与 C 结为夫妻，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的不幸。倒不是我多活了若干年之后才说这话，其实在“恋爱”之初，就已察觉此人难以终身为伴，二十几岁的青春年华，即患有十二指肠溃疡，经常呕吐，瘦弱而一副病相。婚后 30 余年，她没有几天笑脸，总是手捂腹部。从健康状况来看，找这样的妻子为伴，怎能不先我而去撒手人寰。但她却也有坚强的一面，作为“军嫂”有许多常人所不可及之处。例如在我参加慰问团一去两个月期间，她竟在生产下男孩 T 一个多星期之后，没有任何人迎接，以虚弱之身，怀抱婴儿独自出院，乘火车又转乘人力三轮车返回百里之外的安东。单位对一位外出公务人员的家属这般冷漠，军医院竟也如此狠心，把一个孤苦无依的产妇逐出门外，不知是何缘故。待我完成慰问演出回到安东时，婴儿已满两月，家也安顿在原伪满铁路职工家属区，原日本人住宅的一栋平房的家属宿舍。使我这虽然是合法结婚，但始终过着流浪生活的人，第一次有了个像样的家。

院子至少有 200 多平方，如果种满了蔬菜，三五口之家几乎不用买蔬菜。我与小姨子 S 两个人，在院子里种满了豌豆、芸豆、白菜和姜丝腊花。但我并享受不到多少这种城市的“田园生活”，一年有 2/3 的时间跑基层，从大东沟到旅顺口漫长的海岸线，检查属下各团正在进行的防原子国防工程的施工情况，很少在家。领导为了照

顾小姨子S,给她安排在安东市儿童医院当护理员,不久她与河南长葛人当时在军区后勤部营房管理所当管理员的少尉军官路建华结婚。路的为人倒还忠厚老实,婚后小姨子即搬到二经路去住。T在襁褓之中,送入军队的幼儿园不够条件,我又常常出差,只好不远数千里又将岳母请来照顾这个家。由于我年轻太无人生经验,把处在漂泊之中的老母也接了来,以为她们都孤苦伶仃,一起生活既可节省开支,准能和睦相处,相互之间还可以有个照应。谁知她们竟然水火不能相容,家中矛盾重重,以至在邻里中弄得沸沸扬扬。我只好狠着心将母亲暂且安排到别处。


奉命住了一年军校(中排左一为作者)

1956年初,我又奉命去长春第二政治干部学校学习了一年。旧地重游使我感慨万千,也总算暂时摆脱了家庭的烦恼。一年之后提前几天毕业,于农历年三十晚上乘火车回来,这在我的经历中,还是生平以来第一次。既然途经故乡S镇,自然应该半路下车与老母共度初一。临从长春上火车时,不惜重金买了两瓶茅台酒。价格虽然不菲,倒也没有今天这样贵,却耗去了我月工资的1/3。

1957年春回到安东之后,全国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引蛇出洞"的"反右派"斗争。我在军中确有不为领导所喜欢的言论,如果真的打成"右派"也不算稀奇。但多亏了出身好,社会关系清白,经过战争考验这张皮,倒也平安无事地渡过了这一关。夏末秋初,还享受了一次去锦州附近的兴城"八·一"温泉疗养院的为期一个月的"军官疗养"。那是我这一生中的最高享受。当时洗海水澡已经有点儿凉了,那海风、涛声,贵族般的伙食,令人忘记了人间的烦恼。沙滩上挖沙参、拾贝壳,杨树林内采蘑菇也很有趣。终日吃喝玩乐,无所用心,仅仅一个来月就长了好几斤肉。所获沙参回家后泡烧酒喝挺

有味儿。几斤干黄蘑拿回来,还真的摆上了几家人的餐桌。那一小罐贝壳,一直由北到南,在逆境中保存了几十年。

回到安东之后,又是不断的出差。因为目的地都是辽南沿海,每次回家都是带回大量的苹果、海物和鸡蛋之类。作为人夫、人父,也还算得上是个顾家的。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次和同科搞舞台美术的王景章一起出差,我便带上在长春学习时买的花样冰刀,在沿海山村结了冰的水塘内滑冰。工作之余,晚上还在油灯之下,写了一出新编历史京剧《荆轲刺秦王》。幸好没有发表,后来才没有暴露,否则肯定是一株"大毒草",在文革中又多了一条罪证。另一次是身为工作组长,带领几个人去旅顺驻军某工程兵团检查工作。刚巧下火车不远绕过矗立着"表忠塔"的白玉山,便看见了一张十分醒目的海报。上面写着:"通化市京剧团来旅顺盛大演出。"那天是第一天,头一天"打炮"戏是《西厢记》,第二天是《豆汁记》,第三天是《红楼二尤》。再看下面的演员名单,真让我意外惊喜。主要演员是七八年前驻军抚顺时的"解放团京剧团"配角男旦×××,他现已升格为台柱演员。此人当时30来岁,与我的年纪相仿,个子不高,瘦而面黑,还镶有几颗金牙。只记得当时在我的笔记本上签名时,他写的籍贯是"长春市重庆路×号"。而另一个演员名字的发现,更使我惊奇,扮演配角的,竟然是我的老戏友张宏图!此人正是进城之后的1949年冬到1950年夏,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几乎天天晚上聚在一起大唱京剧,唱花脸的人。他是东北决战时的国民党起义部队的下级军官,当时在163师卫生部当药政官。后来于1951年元旦和1952年春节部队在岫岩整编前夕,还在军民联欢会上同台演过戏。整编后各奔东西,一直不知他的下落。谁知他真的由票友而"下海",当了一名职业京剧演员,让我真佩服他的勇气。五行八座都是人干的,人生择业就得有这种精神。此次去旅顺工作之余,想拜访两位曾是军中战友的孙承先和于学恩。他们原本都是旅顺人,都已先于我转业地方。于学恩是1950年参军,在抚顺时同在一个科,当时在大连某车辆厂工作。而孙承先则是1946年春解放战争初期以来的同团战友。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